

四川師範大學文理學院重點項目

宋代傳狀碑誌集成

曾棗莊／主編

第一冊



四川大學出版社



四川師範大學文理學院重點項目

宋代傳狀碑誌集成

第一冊

曾棗莊／主編



四川大學出版社

特約編輯:賀斯認
責任編輯:莊 劍
責任校對:何 靜 高慶梅
封面設計:周 明
責任印制:李 平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宋代傳狀碑誌集成 / 曾棗莊主編. —成都: 四川
大學出版社, 2012. 6
ISBN 978-7-5614-5890-7

I. ①宋… II. ①曾… III. ①碑文—匯編—中國—宋
代②歷史人物—傳記—史料—宋代 IV. ①
K877.42②K820.44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(2012) 第 134049 號

書名 宋代傳狀碑誌集成

主 編	曾棗莊
出 版	四川大學出版社
地 址	成都市一環路南一段 24 號 (610065)
發 行	四川大學出版社
書 號	ISBN 978-7-5614-5890-7
印 刷	成都東江印務有限公司
成品尺寸	185 mm×260 mm
印 張	491.5
字 數	7800 千字
版 次	2012 年 7 月第 1 版
印 次	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定 價	9800.00 圓(全十四冊)

版權所有◆侵權必究

◆讀者郵購本書,請與本社發行科
聯繫。電話:85408408/85401670/
85408023 郵政編碼:610065
◆本社圖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,請
寄回出版社調換。
◆網址:<http://www.scup.cn>

前言

曾棗莊

任何研究工作都必須以廣泛佔有資料為基礎，劉知幾云：

「珍裘以眾腋成溫，廣廈以群材合構，自古探穴藏山之士，懷鉛握槧之客，何嘗不徵求異說，採摭群言，然後能成一家，傳諸不朽。」研究工作更要辨別真偽：「郡國之記，譜牒之書，務欲矜其州里，誇其氏族，讀之者安可不練其得失，明其真偽者乎……故作者惡道聽塗說之違理，街談巷議之損實。」〔一〕

宋代是我國封建社會歷史上一個極其重要的階段，是由古代進入近代的轉折點。宋代的文化輝煌燦爛，居於當時世界的前列，無論在文學、史學、哲學、藝術、科技還是學術文化的其他領域，均富開拓創新精神，取得了超越前代的巨大成就，碩果累累，群星閃耀。正如陳寅恪先生《鄧廣銘宋史職官志考證序》所說：「華夏民族之文化，歷數千年之演進，造極於兩宋之世。」〔二〕

歷史是由人和事組成的。在經、史、子、集四部書中，自然以史書中的人和事最為集中。史書未必都是當代人所撰，而宋人文集中的傳記、行狀、碑銘、墓誌銘，則多是同時代人為同時代人作傳，是研治宋代文學、史學、哲學、藝術、科技以及學術文化其他領域的真正的第一手資料。但宋人文集中的傳記、行狀、

碑銘、墓誌銘很分散，且多達數百種。若能把宋人文集中的傳記、行狀、碑銘、墓誌銘集中在一起，無疑會為研究宋代各個領域的工作提供極大的方便。前人已經做過這樣的工作，如南宋杜大珪編的《名臣碑傳琬琰集》一〇七卷，分上中下三集，上集收神道碑，中集收墓誌銘、行狀，下集收別傳，採諸家別集，而亦間及實錄、國史，與本書所收範圍大體一致。可惜此書收文起自北宋初，訖於南宋初，並非整個宋代；而北宋所收也漏略頗多。我們編纂的這部《宋代傳狀碑誌集成》，旨在網羅整個宋代的傳記、行狀、碑銘、墓誌銘及其各種變體文章，目的在於為各個領域的宋代研究者提供盡可能全面的宋代傳記資料。

一 傳記

吳訥云：「太史公創《史記列傳》，蓋以載一人之事，而為體亦多不同，迨前後兩《漢書》、《三國》、《晉》、《唐》諸史則第相祖襲而已。厥後世之學士大夫，或值忠孝才德之事，慮其湮沒弗白，或事雖微而卓然可為法戒者，因為立傳，以垂於世，此小傳、家傳、外傳之例也。西山（真德秀）云，史遷（司馬遷）作《孟荀傳》不直言二子，而旁及諸子，此體之變，可以為法。《步里客談》又云，范（曄）史《黃憲傳》蓋無事迹，直以語言模寫其形容體段，此為最妙。由是觀之，傳之行迹固繫其人，至於辭之善否則又繫之於作者也。若退之《毛穎傳》，迂齋（樓昉）謂以文滑

〔一〕《史通》卷五《采撰》，四庫全書本。

〔二〕《寒柳堂集》第七二頁，三聯書店，二〇〇一。

稽，而又變體之變者乎？」^{〔二〕}這就是說，傳可分為史書列傳和學士大夫所撰小傳、家傳、外傳兩大類。家傳是指子孫述其父祖事迹的傳記，謝靈運《山居賦》云：「國史以載前紀，家傳以申世模。」^{〔三〕}外傳是指在正史外另為作傳，或為正史中所不載的人物立傳。此外還有自傳、自紀，自己記載自己的事迹，如蘇轍的《穎濱遺老傳》之類。

徐師曾所論大體相近：「按字書云：『傳者，傳也。紀載事迹以傳於後世也。』自漢司馬遷作《史記》，創為列傳以紀一人之始終，而後世史家卒莫能易。嗣是山林里巷，或有隱德而弗彰，或有細人而可法，則皆為之作傳以傳其事，寓其意；而馳騁文墨者，間以滑稽之術雜焉，皆傳體也。故今辨而列之，其品有四：一曰史傳（正變二體），二曰家傳，三曰託傳，四曰假傳，使作者有考焉。」^{〔四〕}

劉才甫（海峰）云：「古之為達官名人者，史官識之；文士作傳，凡為《圻者》（指韓愈《圻者王承福傳》）、《種樹》（指柳宗元《種樹郭橐駝傳》）之流而已。」^{〔五〕}史官所作傳，即紀傳體史書中的世家、列傳，除《史記》中的不少篇章可稱傳記體文學作品外，後世的紀傳體史書，多冗長質實而缺乏文采。倒是文士所作傳不少屬文學性傳記，如蘇軾的《方山子傳》、蘇轍的《巢谷傳》，完全可與劉才甫所舉的韓、柳二傳媲美。文士所作傳如陶潛的自傳《五柳先生傳》，當然是文學作品中的上乘之作。文士所作傳中，還有一種意在諷諭的假託性傳記，如韓愈的《毛穎傳》、柳宗元的《蝸蝓傳》，實為小說家言，屬文學作品。

清黃本驥《讀文筆得》云：「作傳之體有六：一、蓋棺論定，有事迹可紀，傳示後人，如歷代史書列傳是也。一、其人已歿，勳業爛然，私為立傳，為異日人史張本，如諸家集中私傳是也。一、其人現存，於史法不應為傳，而言行有關於世道人心，不可無傳，如韓之《何蕃傳》、蘇之《方山子傳》是也。一、本人自為作傳，以寫其閒居自得之致，如陶淵明之《五柳先生傳》、白香山之《醉吟先生傳》是也。一、借市井細人抒寫己議，類莊生之寓言，如韓之《圻者傳》、柳之《梓人》、《宋清》等傳是也。一、借物行文，仿烏有、子虛之例，如韓之《毛穎傳》、蘇之《黃甘》、《陸吉》等傳是也。」^{〔五〕}可見以傳名篇者很多，有史傳、家傳、託傳、假傳、自傳（又名自紀）、他傳、合傳、附傳、外傳、小傳、補傳、別傳等。下僅略述史傳、自傳、他傳以及諷諭性的類似小說家言的假託性傳記。

（一）史傳

史傳，史官所作傳，即紀傳體史書中的世家、列傳，多冗長質實而缺乏文采。宋代史傳以歐陽修的《新唐書》和《新五代史》為最有名。今舉《新五代史》卷一四《皇后劉氏傳》和卷三二

- 〔二〕《文章辨體序說》，人民文學出版社，一九六二。
- 〔三〕沈約《宋書》卷六七《謝靈運傳》，四庫全書本。
- 〔四〕《文體明辨序說》，人民文學出版社，一九六二。
- 〔五〕姚鼐《古文辭類纂》卷三二，四部備要本。
- 〔五〕《古文辭通義》，武漢大學出版社，二〇〇八。

《死節傳》以見一斑。

《皇后劉氏傳》極寫莊宗劉皇后的陰狠險毒。她出身甚微，因生子而得莊宗專寵；因其生父低微，竟不認父並笞其父；她控制朝政，「交通藩鎮」，「擅寵驥貨」；她計逐莊宗愛姬，對莊宗實際沒有感情，而與他人淫亂；莊宗崩，在赴太原途中，又「與（李）存渥姦」；明宗立，被賜死，才結束了她罪惡的一生。茅坤評云：「劉皇后起自側微，擅寵驥貨，因而濁亂宮中，軍士分崩，以至君上身弑國亡。摹寫種種生色，不讓太史公《呂后紀》及《外戚》諸傳。」〔一〕

《死節傳》序云：「語曰：『世亂識忠臣。』誠哉！五代之際不可謂無人，吾得全節之士三人焉，作《死節傳》。」所傳三人爲王彥章、裴約、劉仁贍。王彥章爲梁將，驍勇善戰，持鐵槍，軍中稱王鐵槍。晉軍破澶州，擄彥章妻、子，遣使招彥章，彥章斬其使以絕其招降。後爲唐莊宗所擒，莊宗愛其驍勇，欲活之，彥章謝曰：「臣與陛下血戰數十年，今兵敗力窮，不死何待？且臣受梁恩，非死不能報，豈有朝事梁而暮事晉，生何面目見天下人乎？」裴約爲後唐澤州刺史。李繼韜以潞州留後叛唐降梁，攻澤州。裴約召其州人，泣而諭曰：「吾能死於此，不能從以歸梁也。」眾皆感泣。後被殺。劉仁贍爲南唐壽州節度使。周世宗攻之不能下，李景兵敗，奉表稱臣，仁贍獨堅守。仁贍子謀出降，立命斬之。士卒皆泣，願以死守。後病死。周世宗曰：「劉仁贍盡忠所事，抗節無虧，前代名臣，幾人可比？」茅坤《唐宋八大家文鈔》卷六九評云：「覽歐陽公所次《死節傳》，王彥章、裴約及

劉仁贍，尤爲嗚咽，或欲泣下。蓋三人者，天之間氣（問世而出的英豪之氣）所生，非五代兵戈晦冥之際所能沒者。而歐陽公點綴情事，當爲千古絕調，即如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，恐多不逮。」

（二）自傳

自傳，又名自紀，自己記載自己的事迹。屈原《離騷》，上陳氏族，下列祖考，先述厥生，次述名字，自敘沉浮，可謂自傳之始。司馬相如有《自敘傳》，只記自少及長立身行事，與《離騷》不同，未記祖先所出。司馬遷《太史公自敘》模仿屈原、相如二家，勒成一卷。揚雄有《自序傳》，王充《論衡》有《自紀》。

自敘之篇歷代都有。多數宋人的自傳都是沿襲陶潛《五柳先生傳》，重在抒情而不在記事。只有蘇轍晚年所撰自傳《潁濱遺老傳》，有十分重要的史料價值而無文學價值，繁冗無文，恐怕只有治宋史者有興趣。正如王若虛所云：「古人或自作傳，大抵姑以託興云爾。如《五柳》、《醉吟》、《六一》之類可也。子由著《潁濱遺老傳》，歷述平生出處言行之詳，且詆訾眾人之短以自見，始終萬數千言，可謂好名而不知體矣。」〔二〕

柳開字仲塗，號補亡先生，撰有《補亡先生傳》，顯屬自傳性質。此文以論爲傳，並未用多少筆墨自述經歷，而以主要篇幅說明他爲何自號「補亡先生」及其著述：「先生始盡心於《詩》、《書》，以精其奧，每當卷嘆曰：『嗚呼！吾以是識先師之大者

〔一〕《唐宋八大家文鈔》卷六三，四庫全書本。

〔二〕《潁濱遺老集》卷三七，四庫全書本。

也，不幸其有亡逸者哉，吾不得見也，未知聖人之言復加何如耳？」尤於餘經博極其妙，遂各取其亡篇以補之。凡傳有義者，即據而作之，無之者，復已出辭義焉，故號曰補亡先生也。」〔一〕

种放，字明逸，號退士，撰有《退士傳》。雖然文章一開頭就說「退士不知孰氏」，實際也是自傳。與柳開《補亡先生傳》一樣，也是自述其論著，但重點在自述其情性：「退士性恬易，善自持，常以聖賢方正之言鑒諸己，或未善，則悔恨立遷。平生寡嗜欲，樂遊雲霞空荒間。常自足，不顧窮困。幼時，拘父兄教，以章句奇偶之學干於時，不遂志。已而盡棄昔之所學，退居空山窮谷中，取九經、六籍、諸史、百家之言合於道者恣讀之，然後知皇王大中之要，道德仁義之本，盡在於是矣……雅尚山林之居，奉母氏，率季弟，結宇巖阿，貧無所資給，亦不戚戚於心，窮年人亦不知其何謂也。每登高丘，步邃谷，延宴坐，見懸巖瀑流，壽木垂蘿，闕邃岑寂之處，則終日忘返。亦忽忽杜門稱疾，隱几常百餘日，人不知其然。吉凶慶弔之外，平時亦罕接人事。不交權貴，所與朋類，自非道義所在，亦不汲汲而取。」〔二〕

歐陽修的《六一居士傳》重點也不是自述經歷，而是自述何以自號「六一」，「自述其退休之志」：「六一居士初謫滁山，自號醉翁。既老而衰且病，將退休於潁水之上，則又更號六一居士。客有問曰：「六一，何謂也？」居士曰：「吾家藏書一萬卷，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，有琴一張，有棋一局，而常置酒一壺。」客曰：「是爲五一爾，奈何？」居士曰：「以吾一翁，老於此五物之間，是豈不爲六一乎？」〔三〕後幅通過主客對話，說明

他自號「六一」不是爲了逃名，而是爲了志樂。

王向，字子直，號公默先生。其《公默先生傳》，通過主客對話寫其處世態度：「剛直任氣」，「不容故去」〔四〕此文雖名爲傳，但從其通篇皆爲主客對話和四六韻語看，實爲以賦爲傳，內容都是論處世態度，實爲以論爲傳。

鄭思肖，宋末太學生，原名不詳，宋亡後，改名思肖，字憶翁，號所南，以示思念趙宋，不忘故國。一生不娶，念念不忘君國之意，每形於詩文中。其《一是居士傳》是一篇自傳，集中表達了他的故國之思。前寫其何以自號「一是」：「一是居士，大宋人也。生於宋，長於宋，死於宋。今天下人悉以爲非趙氏天下，愚哉！嘗貫古今六合觀之，肇乎無天地之始，亘乎有天地之終，普天率土，一草一木，吾見其皆大宋天下，不復知有皇帝、王霸、盜賊、夷狄介於其間。大宋，粹然一天也，不以有疆土而存，不以無疆土而亡。行造化，邁曆數，母萬物，而未始有極焉。譬如孝子於其父，前乎無前，後乎無後，滿眼唯父，與天同大，寧以生爲在，死爲不在耶？又寧見有二父耶？此「一是」之所在也。未死書死，誓其終也。故曰：「死於宋。」次寫「一是」就是「萬古不易之理」，末段自寫其情性，表達了他不與世同流的思

〔一〕《河東先生集》卷二，四庫全書本。

〔二〕《宋文鑑》卷一四九，四庫全書本。

〔三〕《歐陽文忠公集》卷四四，四庫全書本。

〔四〕《宋文鑑》卷一五〇。

想。^{〔一〕}

(三) 他傳

宋代多數的傳記不是自己爲自己作傳，而是爲他人作傳。宋人好議論，石介《鄭元傳》就是以論爲傳，全文屬傳記者僅有開頭的八十餘字：「咸平二年冬十有二月，契丹南牧，鄭氏盡室陷焉。鄭元之父於是乎死於契丹。天聖七年夏四月，元載其母與其孥來歸。十年春三月，元復入契丹。夏六月，負其父骨歸葬於鄆州須城縣廣化鄉水東王管戴村之先塋。」^{〔一〕}觀察推官石介曰：「以下皆是石介的議論：一是稱美鄭元能負父骨而歸葬，二是感慨士大夫之家往往「不克舉其骨歸於而鄉者」，末以主張「推鄭氏之子孝化於天下」作結，望能「旌其人，表其門第，書其實，揭諸天下，且以厚薄俗」。^{〔二〕}此傳善於比喻，善用排比句，頗有生氣。

蘇軾說他「平生不爲行狀碑傳」，但卻爲陳公弼及其子陳慥均作有傳。《陳公弼傳》詳盡記述了陳的仕履政績，末云：「（陳）爲人清勁寡欲。長不逾中人，面瘦黑。目光如冰，平生不假人以色，自王公貴人，皆嚴憚之。見義勇發，不計禍福，必極其志而後已。所至姦民猾吏，易心改行，不改者必誅，然實出於仁恕，故嚴而不殘。以教學養士爲急，輕財好施，篤於恩義。少與蜀人宋輔遊，輔卒於京師，母老子少，公養其母終身，而以女妻其孤端平，使與諸子遊學，卒與忱同登進士第。當蔭補子弟，輒先其族人，卒不及其子慥。公於軾之先君子，爲丈人行。而軾官於鳳翔，實從公二年。方是時，年少氣盛，愚不更事，屢與公爭議，

至形於言色，已而悔之。竊嘗以爲古之遺直，而恨其不甚用，無大功名，獨當時士大夫能言其所爲。公沒十有四年，故人長老日以衰少，恐遂就湮沒，欲私記其行事，而恨不能詳，得范景仁所爲公墓誌，又以所聞見補之，爲公傳。軾平生不爲行狀墓碑，而獨爲此文，後有君子得以考覽焉。」^{〔三〕}茅坤《唐宋八大家文鈔》卷一三九評云：「子瞻嘗自謂平生不爲行狀墓碑，大較敘事文其所短也。此傳亦摹《史》、《漢》，而得其什之二三者。」

蘇軾的《方山子傳》是爲陳公弼之子陳慥（季常）所作傳，尤有文采。文章開頭概述了陳慥少、壯、晚時的爲人：「少慕豪俠，壯欲「馳騁當世」，晚乃隱居岐亭，點出了謂之「方山子」的原因（「其所著帽方聳而高」）。接着寫他們在岐亭的相遇。陳季常得知蘇軾貶官黃州及其原因後，先是「俯而不答」，繼而「仰而笑」，刻畫出這位「隱人」蔑視宦海浮沉的神態。陳季常家「環堵蕭然」，而全家卻有「自得之意」，表現了「隱人」安於淡泊生活的精神。然後文章轉入對陳的回憶。陳季常少時，「使酒好劍，用財如糞土」；西山遊獵，他「怒馬獨出」，「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」，今雖隱居窮山僻壤，但「精悍之色，猶見於眉間」。寥寥數語就烘托出這位「一世豪士」的形象。他「世有勳閥」，有「壯麗與公侯等」的園宅，有「歲得帛千匹」的良田，但「皆棄不取，獨來窮山中」。這篇傳記纔四百多字，並沒有詳細記載陳季常的生

〔一〕《心史·雜文》，明辨齋叢書本。

〔二〕《徂徠石先生文集》卷六，四庫全書本。

〔三〕《蘇軾文集》卷一三，中華書局，一九八六。下引同。

平事迹，僅僅散記了他早年遊俠生活和晚年隱居生活中的二三事，「異人」的形象就已躍然紙上了。全文通篇只敘其遊俠隱淪，而不及世系和生平，與一般傳記寫法迥異。蘇軾自謂於史事不是行家，但此文卻寫得跌宕有奇氣，善於刻畫人物性格，寫遊俠豪氣逼人，寫隱居感慨淋漓，確為傳神高手，是蘇軾傳記文的代表作。高塘評云：「隱俠二字是通篇關鍵。寫豪俠鬚眉欲動，寫隱淪姓字俱沉。傳神之筆，尤妙從隱中追表出來，作倒運格，便寫得隱人非庸人，更自奇變非常。」〔一〕

蘇轍寫得最好的傳是《巢谷傳》。巢谷，字元修，蘇轍的同鄉。《宋史》入《卓行》傳。此傳僅以三件事就刻畫出一位義士形象。文章先寫巢谷棄文學武，已表現得與眾不同：「巢谷字元修。父中世，眉山農家也，少從士大夫讀書，老為里校師。谷幼傳父學，雖樸而博。舉進士京師，見舉武藝者，心好之。谷素多力，遂棄其舊學，畜弓箭，習騎射。久之，業成而不中第。聞西邊多驍勇，騎射擊刺為四方冠，去遊秦、鳳、涇、原間，所至友其秀傑」。次寫他與「熙河名將」韓存寶的金石之交，後韓因罪「自料必死」，託巢谷以後事，「谷許諾，即變姓名，懷銀步行以授其子，人無知者」。這已經表現出「緩急可託」的義士之風。最感人的是，蘇軾貶黃州，巢谷又去黃州看望蘇軾，住於東坡，教蘇軾二子（蘇迨、蘇過）讀書。蘇軾《與子安兄書》說：「巢三見在東坡安下，依舊似虎，風節愈堅，師授某兩小兒極嚴。」元祐年間，蘇氏兄弟還朝，官居高位，巢谷沉淪鄉里，從未去高攀他們。但蘇氏兄弟遠謫嶺南，年逾七十的巢谷卻不遠萬里，徒步往嶺南

慰問。元符二年（一〇九九）春他到達循州，並要到儋州看望蘇軾。蘇轍見他「瘦瘠多病，非復昔日」，遂勸阻道：「君意則善，然自此至儋數千里，復當渡海，非老人事也。」但巢谷堅持要去，結果不出蘇轍所料，行至新州病卒。蘇軾在《巢谷傳》中感歎道：「予聞哭之失聲，恨其不用吾言，然亦奇其不用吾言而行其志也。」〔二〕是的，巢谷因不聽蘇轍勸阻，死於異鄉，令人惋惜；但如果他聽從蘇轍勸阻，巢谷就不成其為巢谷了，他的事迹也就沒有那樣感人。全文語言質樸，不事雕琢，但由於選材典型，詳略得當，巢谷的形象鮮明生動，十分感人。宋代傳記文不甚發達，這是較有名的一篇。唐庚《讀巢元修傳》云：「唐末有鄭遨者，與李振厚善。振仕梁至崇政使，遨未嘗一至其門。後唐同光初，振竄嶺外，遨徒步萬里往見之。其後一百八十年，而宋有巢元修事，事之難得蓋如此。吾聞子由立朝，謗譽有大體，然靳惜名器太甚，良以是失士心。比其敗也，士大夫詆之又過甚。觀其書巢元修事，可勝歎哉，可勝歎哉！」〔三〕明茅坤《唐宋八大家文鈔》卷一六二云：「敘谷豪舉處，有生色，可愛。」

宋代傳記文學不甚發達，葉夢得《賀鑄傳》卻寫得有聲有色。作者從三個方面刻畫賀鑄，一是性格：「賀方回，名鑄，衛州人。自言唐諫議大夫知章後，故號鑒湖遺老。長七尺，眉目聳拔，面鐵色。喜劇談，當世事可否，不略少假借。雖貴要權傾一時，小

〔一〕《唐宋八家鈔》卷七，乾隆刻本。

〔二〕《樂城後集》卷二四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一九八七。

〔三〕《眉山文集》卷九，四庫全書本。

不中意，極口詆無遺辭，故人以為近俠。」文中所記二小事，亦頗能見其「近俠」。一為「諸公貴人多客致之，方回有從有不從，其所不欲見，終不貶也。初仕監太原工作，有貴人子適同事，驕倨不相下。方回微廉得其盜工作物若干，一日屏侍吏，閉之密室，

以鞭打盜竊官物的貴人子證其不畏權貴，讀之，如見其人，如聞其聲。《宋史·賀鑄傳》，基本上是抄撮此傳而成。

(四) 傳異

以杖數曰：「來！若某時盜某物為某用，某時盜某物入於家，然乎？」貴人子惶駭，謝有之。方回曰：「能從吾治，免白發。」即起，自袒其膚，杖數十下，貴人子叩頭祈哀，即大笑釋去。自是諸挾氣力頗頹者，皆側目不敢仰視」。二為「是時江淮間有米芾元章，以魁岸奇譎知名，而方回以氣俠雄爽適先後。二人每相遇，瞋目抵掌，論辯蠡起，終日各不能屈，談者爭傳為口實」。二是詞章：「然博學彊記，工語言，深婉麗密，如次組繡。尤長於度曲，掇拾人所棄遺，少加櫟括，皆為新奇。嘗言：『吾筆端驅使李商隱、溫庭筠，當奔命不暇。』」三是仕途不得志：「方回所為詞章既多，往往傳播在人口。建中靖國間，黃魯直庭堅自黔中還，得其『江南梅子』之句，以為似謝元暉。然以尚氣使酒，終不得美官。初娶宗女，隸籍右選，李中書清臣執政，奏換通直郎，為泗州通判，悒悒不得志。食宮祠祿，退居吳下，浮沉俗間，稍務引遠世故，亦無復軒輊如平日。家藏書萬餘卷，手自校讎，無一字脫誤。以是杜門，將遂老。家貧甚，貸子錢自給，有負者輒折券與之，秋毫不以丐人。其所與交，終始厚者，惟信安程俱致道。方回既自哀其平生所為歌詞，名《東山樂府》，致道為之序，略道其為人大概矣，而予與方回往來亦極密，乃復為之傳，使後世與致道序參見云。」〔二〕以上內容錯落有致，並舉典型事例以證，如

文士所作傳中還有一種意在諷諭的傳記，如韓愈的《毛穎傳》、柳宗元的《蝘蝓傳》，可能所寫也是真人真事，但讀起來卻如小說一樣引人入勝。宋代也有不少這類傳異之作。

王禹偁的《唐河店嫗傳》生動刻畫了一位唐河店嫗：「端拱中，有嫗獨止店上，會一虜至，繫馬於門，持弓矢坐定，呵嫗汲水。嫗持綆缶趨井，懸而復止。因胡語呼虜為王，且告虜曰：『綆短不能及也，嫗老力憊，王可自取之。』虜因繫綆弓杪，俯而汲焉。嫗自後推虜墮井，跨馬詣郡。馬之介甲具焉，鞍之後復懸一毳首。常山民吏觀而壯之。」傳文僅此，作者借此議論道：「噫，國之備塞，多用邊兵，蓋有以也，以其習戰鬥而不畏懦矣。一嫗尚爾，其人可知也。近世邊郡騎兵之勇者，在上谷曰靜塞，在雄州曰驍捷，在常山曰廳子，是皆習干戈戰鬥而不畏懦者也。聞虜之至，或父母轡馬，妻子取弓矢，至有不俟甲冑而進者。頃年胡馬南下，不過上谷者久之，以靜塞騎兵之勇也。」後來邊將取靜塞馬分隸帳下以自衛，結果上谷不守，就在於「選歸上都，離失鄉土故也」。又「月給微薄，或不能充所賜，介冑鞍馬皆脆弱羸瘠，不足禦胡」。作者認為：「誠能定其軍，使有鄉土之戀，厚

〔二〕《石林居士建康集》卷八，四庫全書本。

其給，使得衣食之足，復賜以堅甲健馬，則何敵不破？如是得邊兵一萬，可敵客軍五萬矣。謀人之國者，不於此而留心，吾未見其忠也。故因一嫗之勇，總錄邊事，貽於有位者云。」〔二〕唐河店嫗可能還實有其人，其《烏先生傳》、《暗髻傳》、《休糧道士傳》、《有巢氏碑》〔三〕則純為小說家言。

秦觀的《眇倡傳》為我們記載了一個「意之所蔽，以惡為美」的荒誕故事：「吳倡有眇一目者，貧不能自贍，乃計謀與母西遊京師。或止之曰：『倡而眇，何往而不窮？』且京師，天下之色府也，美眇巧笑，雪肌而漆髮，曳珠玉，服阿錫，妙彈吹，籍於有司者以千萬計。使若具兩目猶恐往而不售，況眇一焉，其瘠於溝中必矣。」倡曰：「固所聞也。然諺有之：心相憐，馬首圓。以京師之大，是豈知無我儷者？」遂行，抵梁，舍於濱河逆旅。」後來果然出現了一位知其儷的少年：「居一月，有少年從數騎出河上，見而悅之，為解鞍留飲燕，終日而去。明日復來，因大嬖，取置別第中，謝絕姻黨，身執爨以奉之。倡飯，少年亦飯，倡疾不食，少年亦不食，囁嚅伺候，曲得其意，唯恐或不當也。有書生嘲之曰：『間者缺然不見，意有奇遇，乃從相矢者處乎？』少年忿曰：『自余得若人，還視世之女子，無不餘一目者。夫佳目，得一足矣，又奚以多為？』」秦觀論贊道：「夫意之所蔽，以惡為美者多矣，何特眇倡之事哉？」〔四〕全文僅三百餘字，故事曲折，富有哲理，實為一篇傳奇小說。

二 行狀

行狀與奏狀之狀不同，奏狀屬奏議，行狀屬傳記，主要記載

死者的世系身份、姓氏籍貫、生卒年月以及一生行事。劉勰《文心雕龍·書記》云：「狀者，貌也。體貌本原，取其事實，先賢表謚，並有行狀，狀之大者也。」李翱《百官行狀奏》論行狀作用云：「勸善懲惡，正言直筆，紀聖朝功德，述忠臣賢士事業，載奸臣佞人醜行，以傳無窮。」〔四〕王柏《答劉復之求行狀書》論行狀起源及古今行狀繁簡之不同云：「某嘗謂行狀之作非古也，又嘗考之，衛文叔文子卒，其子戊請謚於君曰：『日月有時，將葬矣，請所以易其名者。』」請謚之詞，意者今世行狀之始也。周士大夫以上葬必有謚，而勳德著見於時，人所共知，不待其子累累之言，故請謚之詞寂寥簡短，不能數語。後之大夫勳德不能盡表於當時，而人子哀痛之中，難於自述，遂屬以門生故吏，具述行事，以狀其請。自唐以來，有官不應謚，亦為行狀者，其說以為將求名世之士為之誌銘，而行狀之本意始失矣。」〔五〕吳訥《文章辨體序說》云：「行狀者，門生故舊狀死者行業，上於史官，或求誌銘於作者之辭也。」徐師曾《文體明辨序說》云：「蓋具死者世系、名字、爵里、行治、壽年之詳，或牒考功太常議謚，或牒史館請編錄，或上作者乞墓誌碑表之類皆用之。」由此可知撰寫行狀的目的是「上於史官或求誌銘於作者（請人寫墓誌銘）」。行狀內

〔一〕《小畜集》卷一四，四庫全書本。

〔二〕均見《小畜外集》卷九。

〔三〕《淮海集箋注》卷二五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一九九四。

〔四〕《全唐文》卷六三四，四庫全書本。

〔五〕《魯齋集》卷七，四庫全書本。

容較詳，質實少文，很少涉及死者的思想感情及生活情趣，沒有什麼文學價值。

另有一種逸事狀，徐師曾《文體明辨序說》云：「逸事狀，則但錄其逸者，其所已載不必詳焉，乃狀之變體也。」如柳宗元的《段太尉逸事狀》，但記二三逸事，重點突出，人物性格鮮明，具有較高的文學價值。

關於行狀、墓表的規制，蘇軾《與子安兄》云：「墓表又於行狀外尋訪得好事，皆參驗的實。石上除字外，幸不用花草及欄界之類。才著欄界，便不古，花草尤俗狀也。唐以前碑文皆無。告照管模刻仔細為佳。不罪！不罪！」

行狀、碑、誌貴真實。作行狀是爲了「上於史官或求誌銘」，往往因爲美化死者而失真。蘇洵《與楊節推書》批評楊節推所提供的行狀云：「往者見託以先丈之埋銘，示之以程生之行狀……今余不幸而不獲知子之先君，所持以作銘者，正在其行狀耳。而狀又不可信，嗟夫難哉……凡行狀之所云，皆虛浮不實之事，是以不備論。論其可指之迹。行狀曰：『公有子美琳，公之死由哭美琳而慟以卒。』夫子夏哭子，止於喪明，而曾子譏之。而況以殺其身，此何可言哉？余不愛夫吾言，恐其傷子先君之風。行狀曰：『公戒諸子無如鄉人，父母在而出分。』夫子之鄉人，誰非子之宗與子之舅甥者？而余何忍言之？而況不至於皆然，則余又何敢言之？此銘之所以不取於行狀者有以也，子其無以爲怪。」〔一〕此即因美化死者而失真。吳訥《文章辨體序說》云：「碑銘所以論列德善功勳，雖銘之義稱美不稱惡，以盡其孝子慈孫

之心，然無其美而稱者謂之誣，有其美而弗稱者謂之蔽。誣與蔽，君子之所弗由也歟。」

行狀始於漢，到魏晉南北朝時期成爲獨立文體，如《文選》卷六〇所載《齊竟陵文宣王行狀》，《南齊文紀》卷九所載《建平王太妃周氏行狀》，《梁文紀》卷六所載《齊司空曲江行狀》，卷八所載《齊臨川王行狀》，《齊司空柳世隆行狀》，卷九所載《司空安成康王行狀》之類。從宋代起出現了很多長篇行狀。楊慎《辭尚簡要》云：「吾觀在昔文弊於宋，奏疏至萬餘言，同列書生尚厭觀之，人主一日萬幾，豈能閱之終乎？其爲當時行狀、墓銘，如將相諸碑皆數萬字。朱子作《張魏公浚行狀》四萬字，猶以爲少，流傳至今，蓋無人能覽一過者，繁冗故也。」〔二〕行狀長達四萬字，可知其冗。蘇軾有《司馬溫公行狀》，黃震稱頌蘇軾《司馬溫公行狀》詩云：「溫公德業二王佐，坡老文章萬古奇。凜凜遺編生氣在，史遷而下固無之。」〔三〕黃震如此推崇的蘇軾《司馬溫公行狀》也長達一萬三千字。

黃幹撰《朱先生（熹）行狀》並書其後，首論其不得不作此行狀：「行狀之作，非得已也，懼先生之道不明，而後世傳者之訛也。」這篇跋語的主體是爲這篇行狀的寫法作辯解，一是文字「太露」、「太繁」：「有謂言貴含蓄，不可太露，文貴簡古，不可太繁者。夫工於爲文者固能使之隱而顯、簡而明，是非愚陋所能

〔一〕《嘉祐集箋注》卷一三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一九九三。

〔二〕《升庵集》卷五二，四庫全書本。

〔三〕《黃氏日抄》卷六二《行狀》，四庫全書本。

及也。顧恐名曰含蓄，而未免於晦昧，名曰簡古，而未免於艱澀，反不若詳書其事之爲明白也。」二是爲何盡記「年月」、「辭受」：「又有謂年月不必盡記，辭受不必盡書者。先生之用舍去就，實關世道之隆替，後學之楷式。年月必記，所以著世變，辭受必書，所以明世教。狀先生之行，又豈可以常人比、常體論哉！」三是否當略去「太直」、「太訐」之語：「又有謂告上之語失之太直，記人之過失之太訐者。責難陳善，事君之大義，人主能容於前，而臣子反欲隱於後，先生敢陳於當世，而學者反欲諱於將來乎？人之有過，或具之獄案，或見之章奏，天下後世所共知，而欲沒之，可乎？」四是應不應該大量引用其奏疏、申狀：「又有謂奏疏之文紀述太繁，申請之事細微必錄，似非行狀之體者。古人得君行道，有事實可紀，則奏疏可以不述，先生進不得用於世，其所可見者特其言論之間，乃其規模之素，則言與行豈有異耶？事雖微細，處得其道，則人受其利；一失其道，則人受其害。先生理明義精，故雖細故，區處條畫，無不當於人心者，則鉅與細亦豈有異耶？」五是排抑「異學」，稱美朱熹之言並未「失之過」：「至於流俗之論，則又以爲前輩不必深抑，異學不必力排，稱述之辭似失之過者。孔門諸賢至謂孔子賢於堯舜，豈以抑堯舜爲嫌乎？孟子辟楊墨而比之禽獸，衛道豈可以不嚴乎？夫子嘗曰『莫我知也夫』，又曰『知德者鮮矣』，甚矣，聖賢之難知也！知不知不足爲先生損益，然使聖賢之道不明，異端之說滋熾，是則愚之所懼，而不容於不辨也。」(一)宣傳「聖賢之道」，排斥「異端之說」就是這篇《行狀》的主旨，所以他要「詳書」朱熹之事。

如何使行狀、碑、誌行文簡潔一些？一是可互見，詳於彼者可略於此。蘇軾《司馬溫公神道碑》云：「上以御篆表其墓道，曰忠清粹德之碑，而其文以命臣軾。臣蓋嘗爲公行狀，而端明殿學士范鎮取以誌其墓矣，故其詳不復再見，而獨論其大概。」二是只錄大事。蘇軾同文又云：「軾從公遊二十年，知公平生爲詳，故錄其大者爲行狀。其餘，非天下所以治亂安危者，皆不載。」

但有些頗能說明問題的小事也不可不錄。南宋陳良翰字邦彥，官至兵部侍郎，以數文閣直學士致仕。朱熹有《數文閣直學士陳公行狀》，宋濂《題天台陳肅公行狀後》云：「朱子之文，古今共尊，何敢贊一辭！若公事行，或有闕遺，亦學者之不可不知也。」下舉樞密都承旨張說奏請置酒延諸侍從，獨兵部侍郎陳良翰不至。說殊不平，奏良翰「違聖意」。宋孝宗不僅不罪陳良翰，反「除爲諫議大夫，坐客皆愕然」。宋濂云：「孝宗恢復之志，雖上通於天，終莫之遂，不主和者惟張浚、胡銓、張闡、張震及公等數人而已。公平生大節，此最彰著，故朱子特詳列之，而舍巨說細行，亦紀事之體當然耳……孝宗之知人，賢於玄宗遠甚，亦法所合書，豈當時弗知耶，抑偶忘耶？」(二)行狀當「舍巨說細行」，但有些細節又不當舍，此即一例。

由於或失真，或繁冗，故宋人行狀令人滿意者不多。陸九淵有《全州教授陸先生行狀》，朱熹頗不滿意，其《答呂伯恭書》云：「子壽（陸九齡）之亡，極可痛惜，誠如所喻。近得子靜

(一) 《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》卷三四，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本。
(二) 《永樂大典》卷一〇二二，中華書局，一九六〇。

（陸九淵）書云，已求銘於門下，屬烹書之。此不敢辭，但渠作得行狀殊不滿人意，恐須別爲抒思，始足有發明也。」^{〔一〕}

宋人文集中的行狀、碑、誌連篇累牘，但較爲嚴肅的作者卻不願多作，特別是三蘇父子。蘇軾《答李方叔》云：「某從來不獨不書不作銘、誌，但緣子孫欲追述祖考而作者，皆未嘗措手也。近日與溫公作行狀、書墓誌者，獨以公嘗爲先妣墓銘，不可不報爾。其他決不爲，所辭者多矣，不可獨應命。想必得罪左右，然公度某無他意，意盡於此矣。」

宋代也有一些寫得簡明的行狀，如歐陽修的《司封員外郎許公行狀》，全文僅一千三百餘字。首寫其自南唐人宋：「君諱遜，字景山，世家歙州。少仕僞唐，爲監察御史。李氏國除，以族北遷。獻其文若干篇，得召試，爲汲縣尉、冠氏主簿。凡主簿二歲，縣民七百人詣京師，願得君爲令。遷秘書省校書郎、知縣事。」次寫他「數上書論北邊事」：「是時趙普爲相，四方奏疏不可其意者，悉投二甕中，甕滿輒出而焚之，未嘗有所肯可，獨稱君爲能，曰：『其言與我多合。』」次寫其歷官，最後敘其爲人：「君少孤，事其母兄，以孝謹聞。常戒其妻事嫂如姑，而未嘗敢先其兄食，衣雖弊，兄不易衣，不敢易。初，違命侯（南唐後主李煜）遣其弟朝京師，君之故友全惟岳當從，以其家屬託君。惟岳果留不返，君善撫其家，爲嫁其女數人。李氏國亡，君載其家北歸京師，以還惟岳。歷官四十年，不問家事。好學，尤喜孫、吳兵法。初在僞唐，數上書言事，得校書郎，遂遷御史。王師圍金陵，李氏大將李雄擁兵數萬，留上江，陰持兩端。李氏患之，以謂非君不能

召雄。君走上江，以語動雄，雄即聽命。已而李氏以蠟書止雄於溧水，君曰：「此非柵兵之地，留之必敗。」乃戒雄曰：「兵來，慎無動，待我一夕，吾當入白，可與公兵俱入城。」君去，王師挑之，雄輒出戰，果敗死。君至，收其餘卒千人而去。君少慷慨，卒能自立於時。其孝謹聞於其族，其信義著於其友，其材能稱於其官，是皆可書以傳。」

王安石的《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謝公（絳）行狀》更簡潔，不足千字。首敘謝絳仕履，僅百餘字。次評其文章、政事、興學：「公以文章貴朝廷，藏於家凡八十卷。其制誥，世所謂常、楊、元、白，不足多也。而又有政事材，遇事尤劇，常若簡而有餘。所至輒大興學舍。」後又舉數事以實之。「及知制誥，自以其近臣，上一有所不聞，其責今豫我，愈慷慨欲以論諫爲己事。」再傷其不幸早逝：「故其葬也，廬陵歐陽公銘其墓，尤歎其不壽，用不極其材云。卒之日，歐陽公人哭其堂，旆無新衣，出視其家，庫無餘財。蓋食者數十人，三從孤弟妹皆在，而治衣櫛才二婢。平居寬然，貌不自持，至其敢言自守，矯然壯者也。」^{〔二〕}末以簡述其家世作結。茅坤《唐宋八大家文鈔》卷九一認爲這篇行狀「勝歐公誌銘」，勝就勝在簡潔。

黃廉字夷仲，黃庭堅叔父，官至尚書左司郎中，拜給事中。黃庭堅有《給事黃公行狀》^{〔三〕}，王庭珪《跋黃給事行狀稿》云：

〔一〕《朱文公文集》卷三四，嘉靖十一年刻本。

〔二〕《臨川文集》卷九四，四庫全書本。

〔三〕《山谷全書·別集》卷九，光緒二十年重刻本。

「山谷先生文章震耀天下，墨翰以石刻傳者遍九州，而其真迹概見於世者鮮矣。雙井黃子卜家藏山谷所作乃祖給事公行狀稿，亡慮四千字，落落如明珠大貝，自然可貴。方作文時，無意墨翰畦畛間，故能如是。」^(一)「亡慮四千字」也不算短。周必大《跋黃康夷仲行狀》云：「熙、豐、元祐人才參辰相避，冰炭不相入，其或毀譽兩忘者，非棲遲下位而不與事，則脂韋其間而不任事者也。給事中豫章黃公在熙、豐時實任御史，將使指，在元祐時則據公府，踐禁省，出入要劇，獨無間言，其致此必有道矣……予贊曰：『明著祖烈，古人以爲崇孝，山谷斯文，黃氏之鼎銘也。可無傳耶？』」^(二)

鮮于侁字子駿，閬州（今四川閬中）人。景祐五年進士，嘗爲京東西路轉運使，知揚州。秦觀爲揚州人，嘗爲撰《鮮于子駿行狀》，末云：「頡（鮮于侁子）以書走汝陽，請狀公之行義，將乞銘於知公者。某被遇最厚，又嘗辱薦於朝，義不敢辭，輒加論次。而公之行能謀議過人者甚多，難以具舉，取其可考不誣，繫國家之大者著之，以告夫當世之君子云。」奇怪的是蘇軾《與李方叔書》云：「錄示《子駿行狀》及數詩，辭意整暇，有加於前，得之極喜慰……足下之文，過人處不少，如《李氏墓表》及《子駿行狀》之類，筆勢翩翩，有可以追古作者之道。」又《答李方叔》亦云：「承示新文，如《子駿行狀》，豐容雋壯，甚可貴也。有文如此，何憂不達？相知之久，當與朋友共之。至於富貴，則有命矣，非綿力所能必致。姑務安貧守道，使志業益充，自當有獲。鄙言拙直，久乃信爾。照察，幸甚。」則似爲李廌所撰。但李

廌《濟南集》不載此文，其作者尚需再考。而「筆勢翩翩」，「豐容雋壯」確爲《鮮于子駿行狀》的特點。

三 碑銘

吳訥《文章辨體序說》云：「按《儀禮·士昏禮》：『入門當碑揖。』又《禮記·祭義》云：『牲人麗於碑。』賈氏注云：『廟宮皆有碑，以識日影，以知早晚。』《說文》注又云：『古宗廟立碑繫牲，後人因於上紀功德。』是則宮室之碑，所以識日影，而宗廟則以繫牲也。秦漢以來始謂刻石曰碑，其蓋始於李斯嶧山之刻耳。蕭統《文選》載郭有道等墓碑，而王簡棲《頭陀寺碑》亦廁其間。至《唐文粹》、《宋文鑑》，則凡祠廟等碑與神道碑各爲一類。」這裏敘述了碑誌的發展過程及其類別。姚鼐《古文辭類纂·序目》云：「碑誌類者，其體本於詩歌頌功德，其用施於金石。周之時有石鼓刻文，秦刻石於巡狩所經過。漢人作碑文又加以序，序之體蓋秦刻琅玕具之矣。」這裏不僅概括了碑文的發展過程，而且分析了碑文的結構、序銘的含義，銘也是「識之之辭」，序不過是其詳盡說明。碑包括記事碑、功德碑、宮觀寺廟碑、書碑陰、山川碑、城池碑、宮室碑、橋道碑、壇井碑、寺觀碑、家廟碑、古迹碑等。碑主記事，與記類似，不少可算文學作品，如韓愈的《平淮西碑》，柳宗元的《羅池廟碑》，蘇軾的《韓文公廟碑》。

碑文一般是散文，但也有用駢文寫成的，如天聖七年孫慎言

(一)《盧溪先生文集》卷四九，四庫全書本。

(二)《周益國文忠公集》卷一六，道光二十八年刊本。

所撰《天聖宮紀事碑》^{〔一〕}。碑銘一般都是序長銘短，而王安石的《翰林侍讀學士知許州軍州事梅公神道碑》，序文僅一百五十來字，主要敘梅詢之子梅清臣求歐陽修爲作神道碑，而銘文卻長達千字，神道碑的主要內容如家世、名字、里貫、仕履皆置銘中。這是序只敘緣由而銘內敘事迹，是變體。《唐宋八大家文鈔》卷九一茅坤認爲：「通篇以銘序始終，亦變調。」

碑文一般都較繁冗，但也有以簡潔勝者，如蘇軾的《宸奎閣碑》，全文僅一千餘字，首寫懷璉與一般僧人的不同，士大夫喜與之遊，次寫其在仁宗朝、英宗朝都曾上書，乞歸老山中，英宗留之不可，賜詔許自便，遂歸老於四明之阿育王山廣利寺，末寫四明之人建宸奎閣，來求碑銘，爲撰此文，闡述了他儒、釋爲一的觀點。

歐陽修所撰神道碑很多，其《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銘並序》，前敘其仕履，略詳其要事，如因父早卒，隨繼父改姓朱，而少有大節：「公諱仲淹，字希文。五代之際，世家蘇州，事吳越。太宗皇帝時，吳越獻其地，公之皇考從錢俶朝京師，後爲武寧軍掌書記以卒。公生二歲而孤，母夫人貧無依，再適長山朱氏。既長，知其世家，感泣去之南都。入學舍，掃一室，晝夜誦，其起居飲食，人所不堪，而公自刻益苦。居五年，大通六經之旨，爲文章論說必本於仁義……公少有大節，於富貴、貧賤、毀譽、歡戚，不一動其心，而慨然有志於天下，常自誦曰：『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後天下之樂而樂也。』」其事上遇人，一以自信，不擇利害爲趨舍。其所有爲，必盡其方，曰：『爲之自我

者當如是，其成與否，有不在我者，雖聖賢不能必，吾豈苟哉！」他以言事忤章獻太后旨，出通判河中府、陳州。當太后臨朝聽政時，上將率百官爲壽。有司已具，公上疏言天子無北面，且開後世弱人主以強母后之漸，其事遂已。又上書請太后還政天子。「及太后崩，言事者希旨，多求太后時事，欲深治之。公獨以謂太后受託先帝，保佑聖躬，始終十年，未見過失，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。」從他對章獻太后生前死後的態度，充分表現出他爲政識大體。他知開封府時，曾爲《百官圖》以獻，攻宰相用人以私，坐落職，知饒州。爲陝西經略安撫副使，知延州、耀州、慶州，爲環慶路經略安撫招討使，「公爲將，務持重，不急近功小利」。慶曆三年春，召爲樞密副使，以爲參知政事，「每進見，必以太平責之。公歎曰：『上之用我者至矣，然事有先後，而革弊於久安，非朝夕可也。』」既而上再賜手詔，趣使條天下事，又開天章閣，召見賜坐，授以紙筆，使疏於前。公惶恐避席，始退而條列時所宜先者十數事上之。其詔天下興學，取士先德行不專文辭，革磨勘例還以別能否，減任子之數而除濫官，用農桑、考課、守宰等事」。開始推行著名的慶曆新政。不久，「磨勘、任子之法，僥倖之人皆不便，因相與騰口」，「會邊奏有警，公即請行，乃以公爲河東、陝西宣撫使」。後繼知邠州、鄆州、杭州、青州，卒於潁州。末爲作者對范仲淹的評論：「公爲人外和內剛，樂善泛愛。喪其母時尚貧，終身非賓客食不重肉，臨財好施，意豁如也。及

〔一〕 民國《浮山縣志》卷四〇，民國二十四年刊本。

退而視其私，妻子僅給衣食。其爲政，所至民多立祠畫像。其行己臨事，自山林處士、里閭田野之人，外至夷狄，莫不知其名字，而樂道其事者甚眾。」而以銘文作結：「范於吳越，世實陪臣。俶

納山川，及其士民。范始來北，中間幾息。公奮自躬，與時偕逢。事有罪功，言有違從。豈公必能，天子用公。其艱其勞，一其初終。夏童跳邊，乘吏怠安。帝命公往，問彼驕頑。有不聽順，鋤其穴根。公居三年，怯勇隳完。兒憐獸擾，卒俾來臣。夏人在廷，其事方議。帝趣公來，以就予治。公拜稽首，茲惟難哉！初匪其難，在其終之。群言營營，卒壞於成。匪惡其成，惟公是傾。不傾不危，天子之明。存有顯榮，歿有贈謚。藏其子孫，寵及後世。惟百有位，可勸無怠。」歐陽修說他極願爲撰神道，「有千萬端事待要舒寫」。其《與姚編禮（姚辟字子張）書》云：「希文得美謚，雖無墓誌亦可，況是富公作，必不泯昧。修亦續後爲他作《神道碑》，中懷亦自有千萬端事待要舒寫，極不憚作也……此文出來，任他奸邪謗議，近我不得也。要得挺然自立，徹頭須步步作把道理事，任人道過，當方得恰好……本要言語無屈，準備仇家爭理爾。如此，須先自執道理也。」其《與澠池徐宰（無黨）書》云：「大抵某之碑，無情之語平，富之誌，嫉惡之心勝。後世得此二文雖不同，以此推之，亦不足怪也。其官序非差，但略爾，其後已自解云『居官之次第不書』，則後人不於此求官次也。」可知他對此碑頗爲自負。前人對此文評價也很高，黃震《黃氏日抄》卷六一稱此碑所載皆國之大事：「幼孤刻苦，慨然有志於天下；爲諫官，以爭廢郭后貶；制西賊，參大政。碑中所著，皆

繫天下國家之大者。」何焯云：「敘范、呂本末，斟酌稱量，特徵而顯，公文之至者。」^{〔一〕}

後人常把歐陽修的《文正范公神道碑銘》與蘇軾的《司馬溫公神道碑》作比較，歸有光云：「歐陽碑文正公，僅千四百言，而生平已盡；蘇長公狀司馬溫公，幾萬言，而似有餘旨。蓋歐所

長在史家，蘇則長於策論。兩公短長處，學者不可不知也。」^{〔二〕}茅坤《唐宋八大家文鈔》卷五〇也有類似的看法：「歐得史遷之髓，故於敘事處裁節有法，自不繁而體已完；蘇則所長在策論縱橫，於史家學或短。此兩公互有短長，不可不知。」

蘇軾《司馬溫公神道碑》的寫法很特殊，首寫司馬光元祐之政深得人心：「上（哲宗）即位之三年，朝廷清明，百揆時敘，民安其生，風俗一變。異時薄夫鄙人，皆洗心易德，務爲忠厚，人人自重，恥言人過，中國無事。」下舉擒西夏鬼章，四夷稽首請命，黃河復故道以爲證。「凡上所欲，不求而獲，而其所惡，不麾而去。天下曉然知天意與上合，庶幾復見至治之成，家給人足，刑措不用，如咸平、景德間也。」次析元祐之政之所以會取得如此成功，就是因爲「今二聖躬信順以先天下，而用司馬公以致天下士」，就是因爲司馬光深得人心：「公以文章名於世，而以忠義自結人主。朝廷知之可也，四方之人何自知之？士大夫知之可也，農商走卒何自知之？中國知之可也，九夷八蠻何自知之？方其退居於洛，眇然如顏子之在陋巷，累然如屈原之在陂澤，其

〔一〕《義門讀書記》卷三九，中華書局，一九八七。

〔二〕《歐陽文忠公文選》卷八，明萬曆七年茅一桂家刻本。